

汉学主义、中国学主义与国学主义

程章灿

我的专业是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近十几年来，出于了解国外同行研究信息的需要，也比较关注国际汉学的研究动态。最近，注意到以顾明栋教授周宁教授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出“汉学主义”的概念并作了一些论述。这两位学者有不同的学术背景，他们对于同一问题的论述有各自不同的出发点，也有各自不同的指向。周宁教授研究西方人的中国观已持续多年，是这一领域成就卓著的学者。显然，他的论述更多是基于他自身所拥有的丰厚的形象学研究的基础，从文化交流史的角度，分析形象的走样、变形或者扭曲背后的深层原因及其意义。而顾明栋教授似乎更着重于将汉学主义视为一种包含概念、理论、方法和范式于一体的隐性体系，着眼于其方法论与认识论及其背后意识形态意义。如果说，周宁教授的论述是历史研究的延伸，那么，顾明栋教授的论述则似乎可以说是学术现状的分析，虽然各自切入的角度显著不相同，但是，同样显著的是，他们具有相同的理论思考和现实关怀的热忱。这一点无疑应该充分肯定，并且应该特别加以注意。

“汉学主义”(Sinologism)这个概念，是在“汉学”(Sinology, 或Sinologue)这个概念的基础之上提出来的。因此，在讨论“汉学主义”这一概念之前，我认为，有必要先厘清“汉学”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实际上，对于“汉学”这一术语的界定和理解，目前学术界并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其主要观点至少有三种：第一种认为“汉学”是指国外学者对于古代中国以及中国周边民族文化的研究，第二种认为“汉学”既包括国外学者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也包括国外学者对现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及其现状的研究；第三种认为“汉学”研究不仅包括国外学者对传统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也应该包括中国学者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这三种观点对“汉学”的研究主体、研究对象、特别是研究对象的时空范围，理解颇相径庭。而“汉学主义”的概念，显然只能基于前两种观点之上，就这一概念展开论述的具体情形来看，应当更倾向于采用第二种观点对“汉学”一词的界定。对于研究对象的理解，第一种观点与第二种观点有所不同，但二者都强调其研究主体是国外学者，而且主要是指西方学者。但仔细分析起来，在国外（西方）学者这一共名之下，其实包含着千差万别的个体，就其研究方法和学术理念来说，个体之间的不同很难用简单的几句话就概括周全，说明清楚。

众所周知，西方汉学历史悠久，按照目前学术界比较通行的一种说法，它经历过游记汉学、传教士汉学、经院汉学以及现代汉学等几个发展阶段。不同发展阶段的西方汉学，连同其各自的特点及其优劣短长，构成了西方汉学的历史传统。从社会背景上看，西方汉学发展史几乎是与西方列强殖民史相伴而行，列强对中国的殖民政策导向，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汉学教育机构的成立和汉学教授职位的设置。从学术历史上看，西方汉学研究队伍较强、成就较高、影响较大的法国、德国、英国、荷兰以及后起的美国，也正是殖民时代的西方列强。这两种贴合现象，无疑彰显了汉学研究兴起的殖民背景，但是，简单地将汉学研究与其殖民话语等同起来，显然是不妥当的。殖民政策所刺激的是汉语教育和对中国利益的兴趣，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教育和研究兴趣，其所培养的人才也是商务、外交或者传教等方面的实用人才，而不是真正的汉学家，尽管在早期汉学家中，确实有很多人是由这些商人、外交官或传教士转变过来的。他们的身份背景当然会对其汉学研究产生作用，但同时也必须看到，他们在中国的实地生活体验，对于他们理解和研究中国社会文化，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另一方面，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对今天的学术研究影响更直接、也更大的，应该说是现当代西方

汉学所代表的那个学术传统，而实际上，这个传统中又包括了传统欧陆汉学和战后美国中国学两个小传统。

这里所谓欧陆汉学，是指十九世纪以来在欧洲大陆形成的汉学研究传统。1814年，法国在皇家科学院（今法兰西学院）设置了西方第一个汉学与满文讲座教授，法国汉学界泰斗雷慕莎（Remusat, 1788-1832）出任首任讲座教授，开创了西方汉学研究的经院传统。这一研究传统以法国、德国、英国、荷兰等国为主要基地，其学术研究在领域上重视古典中国及其与四裔的关系，在对象上重视基础文献，在方法上重视语文学（philology）训练，并注意借鉴欧洲东方学以及古典学的研究成果。在这个传统中，有一批皓首穷经的学院型学者，他们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为后来的欧美汉学研究打下了重要的基础，对十九世纪以迄二十世纪前半期的汉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到今天，在某些领域、某些学者身上，仍然可以看到这一学术传统的余波。欧陆汉学的语文学研究传统，强调将文本阐释建立在字义训诂的基础之上，颇有点像中国传统的小学。但他们字斟句酌，例如，有人将娥皇译为 **Fairy Radiance**，将 **Maiden Bloom**，将贵妃译为 **precious consort**，貌似直译，忠于原文，有时候其实也不免过度阐释，但这与“汉学主义”似乎并不是一回事。

战后美国中国学基本上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美国发展起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大批外国尤其是欧洲大陆的汉学人才移居美国，为美国汉学研究的兴旺发达提供了人才基础；战后美国的强盛国力，则为此提供了人力物力资源等经济保障；战后逐渐形成并日益加剧的东西方冷战的国际局势，又为推动汉学研究提供了强劲的政治后援。战后美国中国学在研究领域、对象以及方法等方面，与传统欧陆汉学都大有不同。其研究领域拓展到政治、经济诸领域，其研究对象则以现当代中国为重点，尤其关注中国的现状，其研究方法则大量引入西方现代社会科学各学科（如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统计学等）的方法。如果说，欧陆汉学属于东方学或者西方古典学的一支，其古典与传统的指向较为明确，那么，美国中国学则是属于战后兴起的区域研究（area studies）的一部分，其现代和实用的取向亦较明显。因此，在英文中，中国学被称为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总之，一方面，从学术传统和研究方法两方面来看，汉学与中国学都是外国人研究中国的学问，其与中国人研究自己的学问的国学是截然不同的。另一方面，同样是外国人研究中国的学问，中国学与汉学二者之间，其学术传统和研究方法又有明显的不同。

如前所述，“汉学主义”这个概念，是以“汉学”这个概念为基础的。那么顾明栋教授等人为什么采用“汉学主义”的提法，而不采用“中国学主义”的提法一种可能是，在他们看来，“汉学主义”就是“中国学主义”，这两种提法之间本没有分别，所以，用哪一种提法都可以，只不过“汉学”作为学科名称，其历史更为久长一些，因此择而用之。另外一种可能是，汉学主要是指外国人对古典中国的研究，而对于外国人来说，传统中国不仅有空间的距离，时间的距离，还有语言的隔阂，因此，其研究中的“汉学主义”倾向自也更为突出一些故而采用“汉学主义”的提法。当然，这仅仅是我的猜测而已。不管怎样，在西方知识传统和学术体系中，汉学或者中国学应该说是一个比较边缘的学科，而这些年来，汉学研究或中国学研究在中国国内却受到了相当多的学术关注，在某些场合和语境中，这一边缘学术俨然已成为中心话题。“汉学主义”这一概念的提出，并且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似乎也与此一学科从边缘到中心易位的学术背景有一定关系。

顾明栋教授在论述中指出，“汉学主义”从根本上说就是一种思想殖民，其具体表现就是拒绝或者不愿意从中国自身来研究中国，而是站在西方的立场以西方认识论为标准来认识和研究中国。他并且担心中国学者因为急于“与国际接轨”，而唯西方马首是瞻，在知识、精神和自我等方面陷入于自我殖民。从原始出发点来看，“与国际接轨”本来是一个很好的提法，问题在于不能将其简单化。所谓“国际”本来包括很多国家，所谓“轨”更不止一条，应该跟哪个国

家、哪条轨道对接，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对于西方汉学不能笼统对待对于西方汉学家也不能一概言之，他们的身份背景、学术背景、学术方法及其理念各不相同，只有具体分析，才能准确立论。在现当代西方汉学家中，华裔学者是比较特殊的一个群体。就身份背景来说，他们有的来自中国大陆，有的来自台湾或者香港，有的来自东南亚，有的是二战后赴美留学，有的是新时期以后才出国的，而赴美以前的教育背景与学术基础也各不相同。在他们身上有没有“汉学主义”？如果有，是如何表现的？与非华裔学者有何异同？这些都需要仔细分辨，有待深入讨论。

值得强调的是，西方汉学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也不是一个静止的系统。它不断吸纳来自中国和西方的各种学术信息与研究资源，并且从十九世纪开始通过中西方学者的合作、对话与交流，参预到近现代中国学术传统的建设进程之中。以英国汉学史为例，十九世纪英国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与王韬合作翻译中国经典，二十世纪著名英国汉学家霍克思（David Hawkes）留学北京大学，著名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不仅有在中国工作和生活的经历，而且其对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也大量吸收华裔学者参预。而在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上作出重大贡献的文史学者中，很多人都曾经留学西方、受惠于西方汉学，例如胡适、陈寅恪、萧公权、李方桂、周一良等。我这里想说的是，西方汉学传统早已进入中国现代学术传统之中。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汉语语言学研究，对于现代中国学术的影响，已是有目共睹。另一方面，像杨联陞、余英时这样的学者他们既有良好的中国学术基础，又接受了良好的西方学术教育，由于长期活跃于西方汉学界，也就能将中国的学术方法及理念传播于西方汉学界。总之，当今之世，在中国或者外国研究中国学问，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很难确定哪些纯粹是东方的，哪些纯粹是西方的。近年来，在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都有越来越多从西方学成归来的学人，活跃于人文及社会科学研究各领域，在他们的学术中，多少都可以看出东西交汇的特征。如果说有“汉学主义”，那么，恐怕也不只是存在西方的研究和认识中，而是内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之中。

2007年12月5日，我曾经在南京大学研究生会“国学讲坛”上，作了一次题为“国学、汉学、中国学：一种学问，三个世界——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化研究及其他”的演讲。我的主旨是，从表面上看，国学、汉学和中国学各有各的历史，各有各的方法，也各有各的传统，但实质上，三者都是研究中国文化的学问，从长远来看是可以而且必须融通的，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支持从分到合、由多返一的理由，存在于历史经验、体制建设以及全球对话等方面。当然，从目前来看，这种期望仍是理想多于现实。但是，正如刘东在为《喜马拉雅学术文库·阅读中国系列》撰写的序言中所曾经指出的：“在这种深深的渴望之中，国学与汉学这两种自成系统的学术话语，在彼此解构与相互竞争的同时，就仍有可能彼此解毒和相互补充，从而在文明之间激发出辩证发展的‘中国性’来。”

我在那次讲座中，还提出了研究中国学问的三个世界的说法。无疑，这个说法借鉴了毛泽东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提法。毛主席的提法，体现了他对于世界局势的宏观理解，是从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等方面所作的全局把握。我在讲座中借用其说，而加以变通，以中国为研究中国学问的第一世界，以日本为第二世界，以欧美诸国为第三世界。现在看来，我当时作这样的划分，主要是看谁是研究中国学问的大国，而没有更多考虑谁是这一领域研究的强国。不管“汉学主义”的现象是否存在，这一提法至少提醒我们，在衡量和评判中国研究各方的实力时，不仅要看谁是大国，更要看谁是强国，谁的学术影响最深远持久。

纵观学术历史，可以看出，中国、日本、欧美，国学、汉学、中国学，各自有不同的学术焦点和研究范式，也有各自不同的观念与方法，并形成各自的学术圈子与传统。同样，他们各自也或多或少存在认识的盲点和观念的偏差。如果说存在“汉学主义”，那么，似乎也可以说同样存在着“国学主义”，“中国学主义”，只怕我们身处庐山之中，容易对“国学主义”习焉不察。无论哪一种

“主义”，我觉得，都是对研究对象有距离感或者隔阂感，导致认识偏差，理解不足，其中可能也有非学术因素的干扰，但是不是严重到了必须以“主义”相称，我是有一点迟疑的。就学术论学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纠其偏差，补其不足，取其优长，似乎也就够了。

如果说汉学是对国学所代表的那一套中国知识与学术传统的解构，那么，在当下对“汉学主义”这一概念作一番理论探索，则有一种“解构的解构”的意味。当然，我们的目的不在于解构，而是希望在此基础上，能够有学术思考的深化推进。